



政绩诱发摩天大楼过度投资

中国第一份以“摩天大楼”数量来衡量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报告,《2011中国摩天城市排行榜》(以下简称《排行榜》)近日在上海发布后引起业界密切关注。

这份由全国摩天高楼“粉丝”和建筑业、传媒业人士历经1年时间调查编撰的《排行榜》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一摩天楼国家。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已超200座,相当于美国现存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将有一座摩天大楼在我国封顶。5年后,我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

《排行榜》显示,在2011年之前封顶的全球十大高楼中,中国占据半壁江山。除了世界第一高楼在阿联酋迪拜之外,世界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九高楼分别位于中国的台北、上海、香港、南京和广州。

运营压力大空置率高 过度投资前景堪忧

6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发布的首份《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报告》显示,十大摩天城市中进入生活质量指数排名前10的只有广州、上海和北京,分别位列第一、第二和第七。由此许多人认为,城市的摩天楼越多越“不幸福”。

有学者表示,摩天城市与生活质量不成正比,主要原因是经济高速增长与居民生活质量水平存在较大反差,以及居民实际生活质量与主观感受存在较大反差。经济发达和居民幸福指数到达某个临界点就会呈现经济越发达,“城市病”越突出、居民生活越不幸福的“倒U现象”。

还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摩天大楼建设者主要来自地产商,而美国的摩天大楼建设者却主要是来自实体经济。相比之下,中国的摩天大楼出租、出售、管理的运营压力更为沉重。

数据显示,美国高度排名前50的摩天大楼的投资

方,仅16家来自房地产或物业公司,其余34家主要来自零售、石化、汽车、航空、港口等实体经济。而在中国排名前50座已建成的摩天大楼中(不含港澳台地区),房地产企业占了25座。

在我国,摩天大楼建好后空置数年无人问津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在上海陆家嘴,许多摩天大楼的空置率仍相当高。

有专家忧心忡忡地表示,我国现有十大摩天城市已面临过度投资的风险,更何况那些根本不具备“摩天”消费力的二、三线城市,其摩天大楼的规划前景更令人担忧。

摩天大楼隐患多 摩天城市不宜居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宋丁指出,摩天大楼起源于美国,在改革开放后传至中国。摩天大楼的崛起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必然现象。但中国的摩天大楼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一个最大差别,那就是中国的“摩天大楼”蕴含了更多的“政绩工程”概念,许多城市摩天大楼的崛起已完全超越了经济的范畴。

同时,摩天大楼还存在诸多隐患。如至今未能有效解决的摩天大楼火灾救援问题、高层晃动问题,还有不环保、不低碳、投资成本高等问题。有些大楼可能在30层以下是风险可控的,超过这个高度就有难以应对的风险,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建设规划中一味求高的攀比心态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坦言,摩天城市不宜居。他认为,不仅摩天大楼不适合居住,在摩天大楼多的城市生活也有很大的压抑感。现在许多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市民生活质量却没有提高,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政府和企业把太多的钱用于修建摩天大楼。

唐钧指出,中国有灿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但极具历史文化积淀的传统建筑保存下来的却很少,取

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摩天大楼的崛起,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过,不要把老城、老街、老房都拆了。

政绩需求诱发“高度痴迷症” “劳伦斯魔咒”如影随形

对于我国遍地开花的摩天大楼,众多学者认为,最大动力来自地方官员的政绩需求。

唐钧表示,许多地方官员认为摩天大楼的数量代表着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但事实上,现代化应该是人的现代化,并不是建多少个摩天大楼能代表的。

一些地方官员更是以一种小农经济或者暴发户的眼光来看待所谓的“现代化”。有分析人士不无讽刺地表示,这些不符合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的摩天大楼,在当地官员的心目中与旧时的“牌坊”一样,炫耀的成分居多。

另有学者指出,摩天大楼是一种地方官员最能显示财富和实力的“政绩”,比任何政绩更具视觉冲击力,在此思维主导之下,动辄拿出几百亿元的公共投资打造地标建筑,竞相“逐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这种政绩观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却是致命的,1999年德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首度提出“摩天大楼指数”概念。他认为,经济衰退或股市萧条往往发生在超高大楼落成前后,因为这种投资狂热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大厦建成,经济衰退”——这个惊人发现被劳伦斯称为“百年病态关联”,他历数了从20世纪初开始的4轮摩天大楼建设高潮,每一次都伴随着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其中包括帝国大厦、世贸中心以及吉隆坡双子塔楼和迪拜塔。现在来看,劳伦斯魔咒带来的阴云已经开始笼罩那些看上去依然繁荣的摩天城市。

万科董事长王石(微博博客)也曾表示,高楼建设不能抛开现实情况,更不能超越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否则高楼建设将不再是纪念碑、里程碑,而有可能成为墓碑。

(宗和)

天津相声逗你玩了一百年

朱红

天津人爱听相声,你坐在出租车里,能听一路的相声,因为出租车司机们大多喜欢相声。天津电台播出的相声很多外地人都没听过,不是那些全国流行的段子,但是非常好听。

天津的年轻人也爱听相声,你到听相声的剧场或茶馆看看,那里多一半是年轻人。他们能叫得出演员的名字,有的能点段子,还有的能背下大段台词。

问他们一个段子听那么多次,怎么不腻啊?他们会反问你:你听音乐、听歌曲不是也不腻吗?相声是天津人的音乐,天津有孕育相声的丰厚土壤。

相声在清代发源于北京。但是却成熟于天津。所以有相声“生在北京,长在天津”的说法。而天津被认为是相声演员成名的必经之地。

光绪初年,一个叫裕二福的满族人来到天津,在天津的北开市场撂地“画锅”,说起了相声,这是相声最早来到天津。“画锅”是当时的说法,是指早期相声艺人用白沙子在地上画个大圆圈,就地现场表演,取靠它吃饭的意思。

至1900年以后,来的人多起来,当时有点名气的有李德锡(艺名“万人迷”)、焦德海、马德禄、张德泉(艺名“张麻子”)、郭瑞林等来津,演出于西城根儿的“明地”。以后的往返京津之间,有的定居天津,一些人在天津收徒传艺,成为天津相声的开拓者。

满族人说相声,属于“清门”,也就是现在说的票友,不是专门靠卖艺为生,与民间的“浑门”演员有些不同。当时的清门相声演员多是八旗子弟,能够舍弃面子撂地画锅求生存,也实在不容易,生活所迫。那时的天津,三不管地界就在南市三不管地带。“撂地”卖艺的地场分为三等:上等的设有遮凉布棚和板凳;中等的只有一圈板凳;下等的什么设施都没有,只有一块空地。当时相声艺人自嘲过的是“雨来散”的日子,即“刮风减半”,下雨全无”。一下雨,人一跑,摊子就散了。

“撂地”卖艺挣钱不容易,有时说完一段要钱,观众却一哄而散。艺人惯耍的“生意口”是:“小哥儿几个侍候您一场不容易,玩艺儿是假的,精气神儿是真的。带着零钱,您费心掏点儿。带多了多给,带少了少给。”“您若身上不方便,没带钱,许您白瞧白看,请您站脚助威。”有时为了凑够整钱,加演小段,凑足以后,再接着演。

进入曲艺场是所有旧时相声艺人的向往,意味着上了档次。旧时天津的曲艺场有“四海升平”、“宝和轩”;南市的连兴茶社、鸟市的声远茶社等。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有剧场式的杂耍园子“小梨园”、“大观园”等。能进这些地方说相声,大小也得是个腕儿了。

相声虽兴起于北京,但天津是相声的“码头城市”,艺人只有在天津说红了,得到认可,他才敢进北京。许多著名的相声演员都是在天津演出过多年,成名后才走向全国的,侯宝林、张寿臣、郭荣起莫不如此。马三立先生也是在天津成名的。1940年侯宝林应邀到津,一举成名,后来红遍全国。

来天津不能不听相声。我听相声的地方叫群星剧场。群星过去是儿童剧场,不大,但是也绝对不小,容纳几百人没问题。剧场一看就是比较老派的剧场,现在兼做群众艺术馆,这地方想必不应该是新新人类或者年轻人去的地方。我以为这里会很冷清,我以为全是上了年纪的人来这里。但是,我想错了。

那天正好是春节前给地铁职工的一场专场演出,我坐在前排椅子上,回头一看,几乎满座,过去开先进人物事迹表彰大会也不过如此了。而且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

上场的演员个个身穿长衫,台上的桌子上放着纸扇、手帕之类的道具,一看就是传统相声的规矩和习惯。演员说的差不多也全是传统段子,我也算是爱听相声的,但是这些段子我一个没听过。

我没听过,但是在座的天津人听过,他们知道包袱在哪儿,他们能接下茬儿。让他们上台客串肯定没问题。每个城市都能列举几个自己的大腕儿,天津最大的腕不是某个歌星、影星,而是相声演员。天津年轻的追星一族,有不少追的是相声演员。他们熟悉这些相声明星们的看家段子和风格,甚至个人喜好。演员返场的时候,他们能点出他们的压轴段子。

后来还跟着朋友又去了一次茶社,茶社比较平民化。在茶社听相声比在正规剧场随便多了,也亲切多了。燕乐茶社位于和平区一条破旧的街道里,茶社门口被零散的自行车拥挤着,几张贴着红纸的演出告示牌散摆在门外。众友相声的条件很简陋,门票只6块钱一张。一个大妈算是服务生了。她递过来一个装着茶叶的瓷杯和一瓶热水,你自己找个地方坐下就行。剧场很小,舞台只比观众席高几个台阶,距离也挨得很近,十几个黑色的大方桌已经坐了七八成客人,醇茶味、橘子皮味和烟味在空中弥漫着,嗑瓜子声、喝茶倒水声和聊天声唧唧喳喳。别小看了这地方,以前马三立就在这里说相声。

相声本来就是有这样朴素而低层的老百姓中成长成熟起来的,相声就该这么听,该叫好的时候叫好,该鼓掌的时候鼓掌,该喝茶的时候随便喝茶,进进出出喧嚷闹闹,不拘形式。

在天津这地方,即使是个匆匆过客也不会觉得寂寞,因为总是有人“逗你玩”。

新疆博斯腾湖捕鱼节开幕

6月18日,新疆博湖县渔民在捕鱼节上表演蒙古族传统祭湖仪式。

当日,新疆博湖县第四届捕鱼节在博斯腾湖渔港码头开幕,博斯腾湖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是新疆最大的有机鱼生产水域。在捕鱼节暨祭湖仪式上,近万名湖区百姓与来自各地的游客通过参加传统的祭湖仪式、观看巨网捕鱼等娱乐活动,共同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祝愿。

(刘学忠 摄)



最富30个城市排行:东莞居首

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全国第三届地州市盟相对富裕程度与统筹发展监测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中“第三届全国相对富裕地区”排行也随之出炉。

全国相对富裕地区就是中郡富强指数为A+级I类地区,共计42个,占总数的13.21%;人口1.64亿,占全国地州市盟总人口14.85%。相对富裕地区在省市分布情况为:安徽3个,福建2个,甘肃1个,广东5个,河北1个,河南1个,黑龙江1个,湖南1个,江苏2个,辽宁2个,内蒙古5个,山东5个,山西1个,新疆2

个,浙江7个。由此可见,全国相对发达地区在东部沿海地区呈网络分布,在其他地区呈点状分布。

富裕程度前十名的地区依次是:广东东莞市、新疆克拉玛依市、江苏苏州市、广东佛山市、江苏无锡市、广东珠海市、广东中山市、浙江舟山市、浙江温州市、江苏常州市。

从评价报告得知,除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等四个直辖市外,地区相对富裕程度最高的前三个省区是:浙江、广东、江苏。

与历届评价方法类似,此次地区相对富裕程度是

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参照坐标,全面考察居民收入、消费、储蓄、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发展和财政调控能力等。对此中郡研究所所长刘福刚表示,“这样做比单纯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富裕程度应该更具有综合性,因为地区相对富裕程度内涵不仅包含当年增量,还包含多年存量。”

据了解,第三届报告对全国各省市相对富裕程度排序与人均GDP排序进行了对比,对各省市相对富裕程度排序和GDP排序进行了对比,从比较表中可以看到有些省份两者的排序出现比较明显的差异。